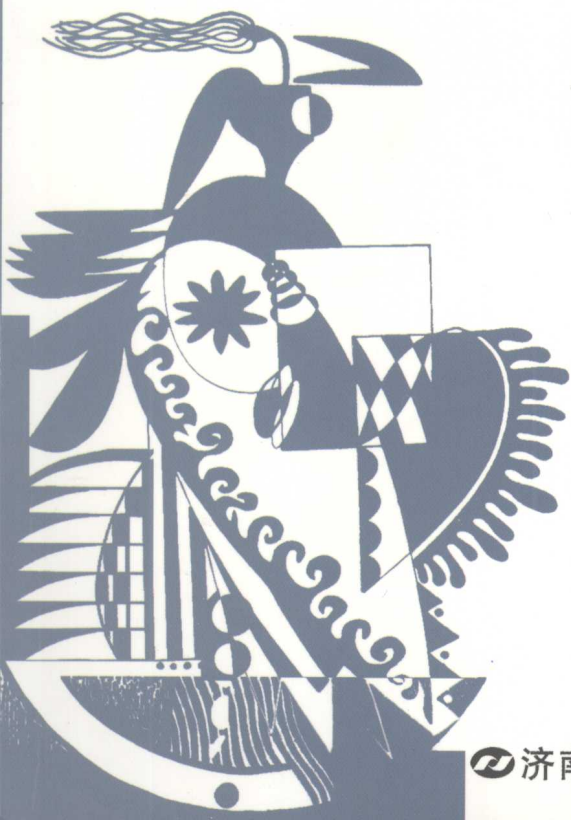


中國學研究



Sinology Studies

第十輯



◎ 济南出版社

中國學研究

(第十輯)

吳兆路 甲斐勝二 林俊相 主編

濟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研究. 第十辑/吴兆路,(日)甲斐胜二,(韩)林俊相主编.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710-476-6

I. 中… II. ①吴… ②甲… ③林…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5453 号

封面题字 冈村繁(日本)

责任编辑 赵志坚 吴敬华 王淑新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0531)86922073 86131735

网 址 www.jn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1094mm 1/32

印 张 15.375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10-476-6

中国学研究

(第十辑)

学术顾问 王运熙 顾易生 王水照 潘富恩 冈村繁(日本)
清水凯夫(日本) 崔溶澈(韩国) 杨端志

主 编 吴兆路 甲斐胜二 林俊相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杜晓勤(北京大学)

方 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甲斐胜二(日本)

林俊相(韩国) 朴均雨(韩国)

任元彬(韩国) 孙明君(清华大学)

吴兆路(复旦大学) 张 兵(复旦大学)

执行主编 丁少伦, 吴兆路

责任编辑 赵志坚 吴敬华 王淑新

封面题字 冈村繁(日本)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印刷监制 郭建业



卷首语

《中国学研究》经过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是一种高档次、高品位且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辑。当然,这类专辑的出版,如果没有国内外一些师友的积极鼓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恐怕是很困难的。值此,我们真诚地说声“谢谢”。

《中国学研究》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其撰写人员一般是博士毕业或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大学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在中国留学即将毕业的外国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也在遴选之列。稿件一般由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送请有关专家预审。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中国学研究》犹如一个窗口,为我们了解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作为编撰者,我们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风格。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征集渠道还不是特别畅通,所以对有些优秀论文不能入选我们深表惋惜。本专辑今后将注意扩大国别区域的覆盖面,增强精品意识,多发表一些功底深厚、富有创见、新颖独特的好文章,以繁荣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国学研究》目前暂定为每年出版一辑,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稿件。稿件一般限于一万字之内,并请提供论文电子文档和打印稿,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国内联系人:吴兆路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邮编:200433)

E-mail: zhaoluwu@fudan.edu.cn

国外联系人:甲斐胜二

通讯地址:日本千814 福岡大学人文学部

E-mail: kaika@fukuoka-u.ac.jp



目 录

专家论坛

- 1 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符懋谦(新加坡)
- 10 越南赋对中国赋的借鉴与创造/潘秋云(越南)
- 16 诸宫调的兴起及其成因/张兵

古代文学思想研究

- 25 《离骚》的情感结构及影响/彭晓玲
- 31 论《乐记》的艺术创作思想/吴建民
- 37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新释/田义勇
- 45 也谈“建安风骨”的接受——兼与涂波先生商榷/王芳
- 53 试论杨万里的晚唐观/云艳仪(马来西亚)

六朝唐宋文学研究

- 63 论六朝吴越本土士人对观音信仰的接受/刘鹏
- 71 南朝记游骈文的艺术追求/何祥荣(中国香港)
- 84 西晋诗歌女性形象初探/王小燕
- 91 美的异介同源
——从魏晋“言意象争辩”到诗歌、绘画、意象的相互关系/许平
- 99 论王起律赋与中唐科举考试的黏附与偏离/郑婷

明清文学研究

- 108 明初杂剧的道德化、宫廷化倾向/甄炜旋
- 116 王九思交游考/刘芸
- 124 竟陵体论/魏宏远
- 131 明末清初的遗民文学思想探析/常然
- 139 朱彝尊与屈大均交游考/雍琦
- 148 史料证明:《红楼梦》不可能取材曹家/方沪鸣
- 159 试论《秋水轩尺牍》与《雪鸿轩尺牍》之文学价值/吴迪



- 165 英雄惯作欺人语
——曾国藩与桐城派关系再检讨/刘奕

- 172 清及晚近的苏轼诗词误读现象论略/陈晨

近现代文学研究

- 181 鲁迅与内山完造
——回顾 1930 年代上海内山书店/岛田聪(日本)

- 188 浅析孔乙己/彭九善

- 194 难以割舍的音律美
——浅析俞平伯《冬夜》诗集/李清宇

- 200 黎锦晖流行歌曲的特色/王丽慧

- 207 沈从文小说的时间意识/张冉冉

- 216 《倾城之恋》的反讽手法/洪德伟(中国香港)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

- 223 王国维与佛教
——以《人间词》的“人间”为中心/吴兆路 张兵

- 228 周作人与六朝文学/权绘锦

- 237 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折
——解读《新月诗选》/程蓉

- 243 外来文化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金在熹(韩国)

语言文字学研究

- 247 现代汉语“使”字句与日语相关句式比较/仲岭 亚希子/(日本)

- 256 汉语时间隐喻研究/李安(韩国)

- 270 拟声词的发展趋势问题/李镜儿(韩国)

- 276 现代汉语形容词与“过”/郑姝妍(韩国)

- 291 交际语境中的语体/曹京渊

- 299 古汉语单音节否定虚词的语源学透视/殷守彬

- 308 从汉语方言中见系字的读音类型看 i 介音在汉语音系结构格局中的作用/刘雪霞

- 316 《四声通解》词语札记/董建交

- 323 近代汉语动相补语研究述评/朴元基(韩国)



331 语境与幽默语言/徐磊田

336 先秦时期口语传播研究综述/张伟

古代文献学研究

342 《〈王世贞年谱〉补正》商兑/郑利华

347 《越缦老人诗札》辨伪/张桂丽

353 关于兰雪堂铜活字本《艺文类聚》之校勘价值/孙麒

361 探索古籍版本学传统研究体式的新路径

——评陈先行著《打开金匱石室之门——古籍善本》/石祥

366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论语详说》作者考辨/徐潇立

376 《水浒传传评林》的文本价值/葛春蕃

385 从《古今笑》到《古笑史》的文本变迁看清初的出版策略/杨洋

393 “独孤云移天雄”辨

——兼考许棠咸通十一年前后行踪/黄俊铨

传统文化研究

399 《周易》关于君子理想人格类型与境界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探询之三/谭德贵

407 南北朝时的道教与世风/郑筱旻 郑正

415 谈司马光非“正统”史观的特点/白盛友(韩国)

419 谪仙和最后的贵族

——文学和影视中的文化的比较/胡大志

423 20世纪以来陆贽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朱红霞

429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辨析/梁翔宇 高雪飞

442 家族制企业的文化理论解读/马明 苏勇

448 民国时期的军人抚恤立法/岳宗福

454 中国近代社会保障的理念嬗变和制度初创/李瑜

459 古代趵突泉的喷涌与断流/张华松

466 泰山石刻与史学研究(上)/周郢

476 文化中国的巡视/赵树红

国外汉学家

479 苏联的两个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和谢德明/朱瑞真 单令魁



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符懋濂(新加坡)

世界历史上的几个大帝国,如以意大利为中心的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公元66~476年)和以波斯为中心的阿拔斯—穆斯林帝国(亦简称为阿拉伯帝国,Muslim Empire of The Abbasids,公元750~991年),一旦四分五裂、土崩瓦解,就再也无法重建、统一起来了。反观中华帝国则不然:公元220年,东汉帝国覆亡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大分裂时代长达三百余年之久;但到了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而且把统一大帝国的衣钵传给唐王朝,使汉帝国的大一统光辉再现于神州大地。从隋唐到明清的一千四百余年间,中华帝国即使发生分裂,最终又重归于统一。

诚然,中华帝国“分久又合”的原因很复杂,我们必须从地理、历史、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探讨、剖析,因为单凭一两个层面的研究,恐怕是无法揭开这个谜底的。

就地理背景而论,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W. F. Hegel,1770~1831)从历史哲学角度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并阐述了地理条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国历代王朝所统治的是连成一体的中国大陆板块,所以比较容易征服、控制与治理;若是由星罗棋布的群岛组成的帝国版图,一旦四分五裂,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政府就会鞭长莫及,很难使它重归统一。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本身“背山面海”,也提供天然屏障:东方和东南方是汪洋大海,西面则有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将东亚大陆和南亚、西亚、中亚隔开,使得来自西方的强大势力很难从西边侵入中国大陆,破坏中华帝国的统一,这是地理条件整体统一性形成之物质基础。此外,中国大陆的地形西部高、东部低,形成三个阶梯状,黄河、长江、珠江



之水都向东流,构成联系三大流域(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坚韧纽带;从水资源的利用到水路的交通运输,都为政治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再说,中国大陆地形极其复杂,东西部地区的气候、土壤各不相同,又形成了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这却正是促进各地区经济联系的自然因素,也是地理条件整体统一性形成之物质基础。自秦汉以来,中国虽然是个多元民族的帝国,除了汉族外,还有很多其他民族,但大多属于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比汉族少得多,而且经济文化都比汉族落后,所以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在中华帝国内长期割据一方或独立建国。

就历史背景而论,秦帝国是经过春秋战国时代数百年兼并战争而形成的,再经过汉帝国四百年的统治,为日后历代帝国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其中包括建立为帝国统治服务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及把儒家思想列为治国之道。早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是个中央集权、主权完整、领土统一的“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像汉帝国这种类型国家(即“民族国家”)在欧洲出现,如葡萄牙王国、西班牙王国,比在中国晚了大约一千五百年,所以欧洲不具备“分久又合”这个历史条件。秦汉帝国中央政府或朝廷不但已能有效地统治全国土地和人口,而且从此之后,帝国统一成了历史之“常”(政治常态),一直居于历史主流地位。帝国分裂则属于历史之“变”(反常状态),即便出现,最终也得让位给帝国统一。秦汉以后的政治分裂,大多数和西北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有关,其中如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这些所谓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主动接受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

就经济背景而论,秦统一中国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到了战国时代末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灌溉的广泛使用,农业经济空前发达,人们对政治统一的要求更加强烈。这个因素在以后历代统一事业中,继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农田水利灌溉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而较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资源的合理利用都需要以政治统一为大前提。如果帝国四分五裂,这些问题(包括灌溉、抗洪)就不能妥善解决了。传说中大禹治理水患,并被尊奉为“圣人”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中国对抗洪的高度重



视。与此同时,自秦汉时代开始,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日渐发达,货币流通增加与增广,商人地位日益提高,所以他们希望并支持政治统一,以便消除对商业的人为干扰、阻碍,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国内市场。在对外贸易几乎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显得特别重要,两汉、唐宋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更是如此。

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大背景所释放的文化意蕴,必然集中反映在古代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中。大一统历史观由两个层面构建而成,一个是观念层面,另一个是制度层面。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只存在观念层面的大一统,而秦汉帝国的建立与发展,促使观念层面的大一统转化、提升为制度层面的大一统。于是出现了两个层面的重叠现象,即观念层面大一统与制度层面大一统并存的文化构建。

在先秦诸子中,儒、法、墨三家思想各异,但它们几乎一致认为,为了避免战祸连年,唯有实现全中国的政治统一。孟子总是站在“王天下”的高度来议论政治问题,如他论王道、仁政时曾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又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即“王天下”,“王”字作动词用,即作“为天下之王”、“统一天下”解)。又如梁襄王曾问孟子,要如何天下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要政治统一才能安定”(“定于一”)。^①商鞅认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②至于墨子主张“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同样是从“王天下”的角度出发,认为选贤与能则可“天下平”、“九州成”：“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③

产生于先秦的大一统理念,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吕不韦《吕氏春秋》不但高度颂扬由“五德终始”与天人合一所带来的政治大一统,而且将政治的治乱、社会的安危直接和政治大一统相提并论,确认两者构成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④到了西汉武帝时,大一统理念得到了高度的提升,获得了正统的统治地位。董仲舒以“天人感应”阐述“皇权天授论”,即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以天下人必须绝对服从天子,不得违抗天命或天意。同时,为了巩固汉帝国的政治大一统,朝廷还必须推行思



想大一统,即定“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为一尊,其他思想学说“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⑤

对于有为的古代帝王将相而言,建立功业(立功为“三不朽”之一)而使生命价值得以延续,是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实现或维持帝国政治大一统的本身,就是古代帝王将相责无旁贷的政治使命,并且受到历史的肯定、赞扬;反过来说,凡是昏庸无能、苟且偷安的古代帝王将相,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嘲笑、非议乃至谴责。例如房玄龄《晋书》讥笑西晋惠帝的一段文字,就使得昏庸的惠帝被传为后世之笑柄:

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⑥

房玄龄最后还加上一段“史臣曰”来加以评论:“古者败国亡身,分镳共轡,不有乱常,则多庸暗。”凡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在各代史家心目中难免黯然失色。例如李延寿《南史》对东晋偏安江左批评道:

论曰:晋自社稷南迁,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勳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自斯以后,帝道弥昏,道子开其祸端,元显成其衅末。^⑦

纵观两千余年中国古代史,自秦代至清代,“为王”者在建立新王朝之后,都必须集中力量实现全中国的政治大一统,这样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也才能巩固其政权。即使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同样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统一王朝,都实现了政治大一统。这种将“天下一统”与“正统地位”直接挂钩的历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帝国“分久又合”乃至“分久必合”!

从唐代开始,大一统思想已由观念层面充分转化、提升为机制层面。只有在机制层面的支撑下,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可行性与现实性才能存在,大一统理念才能转变成一种物质力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挥其政治作用。所谓机制层面的大一统,在此是指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制、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沿用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以及独一无二的文字系统。以上四者,除了科举制度,其他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它们既是



大一统思想在机制层面的体现,亦是为政治大一统服务的物质或精神力量,构成大一统思想的四大支柱。大一统思想的观念层面与机制层面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废封建、立郡县”,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之制,在地方设郡县之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制。在取代秦之后的四百年间,汉继续沿用郡县制与三公九卿之制,只作了一些微小的改变(如东汉末设州、郡、县三级制),就说明了这一中央集权的机制是行之有效的。对于这一点,西方历史家也予以极高的评价,如著名的英国现代史学家汤恩比(A. J. Toynbee)认为“凡是中央集权的政府,如果没有一种职业文官的制度,是不行的”。“就成果的持久性来说,汉朝的创建者可以算是所有统一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⑧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政府的管理机制却不尽相同。到了隋统一南北,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制随着大一统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最终以三省六部制取代三公九卿制。隋王朝寿命短暂,经二世而亡,但其所创立的典章制度多为唐王朝所沿袭,其中就包括了以“三省六部制”为标志的政府机制。和中央集权体制相适应的唐代地方政府机制也同样沿用隋制,只是将郡县制改为州县制。相当完善的中央集权政府机制的建立,是维持帝国政治大一统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唐帝国领域辽阔(约有6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还必须建立一套制度来解决交通与通信问题,驿站制度即由此产生。^⑨像这样完整而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机制,在古代或中古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比较严密、进步的,所以它在中国世代相传,不断完善,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皇权能够伸展到中华帝国疆域的每个角落,政治大一统的实现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中华帝国不仅疆域广阔,人口众多,而且又无共同的宗教信仰以维系人心,所以单凭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政府机制,还不足以维系帝国的政治大一统。换句话说,在交通与通信尚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要维系中华帝国的政治大一统,就非推行思想大一统不可。因此,从西汉武帝时开始,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提升为汉帝国的正统思想、统治思想。于是孔孟成为至圣先师,儒家著作成为必读经典,儒术成了进入官场、参与政治的敲门砖。关于汉帝国政府推崇儒家思想的



原因,冯友兰在1920年代提出的学术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他首先认为“及汉之初叶,政治上既开以前未有之大一统之局,而社会及经济各方面之变动,开始自春秋时代者,至此亦渐成立秩序。故此后思想之渐归统一,乃自然之趋势。秦皇、李斯行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前,汉武、董仲舒行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后,盖代表一种自然之趋势,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⑩接着论及“儒家所以能独尊之原因”,冯友兰提到两点:

即秦汉大一统后,欲另定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新制度,亦需用儒者为之。盖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又有自孔子以来所与各种原有制度之理论。再有一点,即儒家之六艺(即“六经”——引者),本非一人之家学,其中有多种思想之萌芽,易为人所引申附会。此富有弹性之六艺,于不同之思想有兼容并包之可能。儒家独尊,与儒家本身不同之学说,仍可在六艺的大帽子下,改头换面,保持其存。^⑪

我基本上赞同冯友兰的见解,尤其是他所指出的儒家思想“兼容并包”这个特性及其所衍生的中庸之道,这些特性使它较容易被不同思想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所谓“有容乃大”,就是兼容性(或包容性)使儒家不断吸纳其他的思想成分,包括法家、阴阳家、道家乃至外来的佛家思想,使儒家自己不断更新、壮大,变得博大精深,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宋明理学就是儒学吸收佛、道二家某些学说成分的新产物,故被称为新儒学。又如历代中华帝国所采取的统治政策,多是儒法兼施并用,或者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就是“阳儒阴法”,即标榜儒家之道而推行法家之术。冯友兰还指出,兼容性并不损害或削弱儒家的权威性,因为“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为一般人所信受。经学虽常随时代而变,而各时代精神,大部分必于经学中表现之”。^⑫

“有容乃大”不仅是一种儒家精神,不仅使儒家思想具有凝聚力、生命力,而且它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中华帝国政治大一统既十分有利,也十分重要。儒家思想的世俗性、兼容性和权威性使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趋向于多元性,所以从根本上排除了一元论信仰的极端化,消除了宗教战争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历代统治



者还可充分利用儒家思想的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之有利于政治大一统的重建与维系。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对中华帝国大一统所产生的作用,是十分显著、深远的。相比之下,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对政治大一统的影响,都难望儒家思想之项背,因为这两种宗教都比较缺乏兼容并包精神,无法长期维系基督教世界或伊斯兰教世界内部的政治大一统。

中华帝国政治大一统必须由政治人物来实践,从帝王将相、朝廷百官到州县的地方官吏,理论上都应是政治大一统的建立者、维系者。对于一个庞大帝国来说,帝王将相固然重要,朝廷百官、地方官吏也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政治角色。因此,如何选拔官吏自然就成为历代帝国政府所面对的重要政治课题。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独创性产物,也是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体现。当然,若以现代视角来看,科举制度并不完善;但若以历史主义视角来看,科举制度却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选官用人办法,而其独创性与政治作用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选贤与能”作为科举制度的基本理念,其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广开政治门路,打破世族垄断朝政的局面,从而网罗全国人才为帝国各级政府效命,为帝国政治大一统服务。

毫无疑问,在教育未普及、人才很短缺的历史条件下,科举制度的政治作用尤为显著、重要。它不仅将选官用人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强化了皇权或中央集权,而且网罗全国人才,扩大了帝国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对帝国政治大一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时期,欧洲各国的教士阶级与贵族阶级把持政权,将世俗地主与商人排除在朝廷之外,而中国的寒门庶族(包括地主、商人与平民)居然有幸借助科举参与政治,和世家豪族分享政权,甚至取得高官厚禄(最高可当宰相——布衣宰相)。他们始终是政治大一统的拥护者、构建者,因为唯有政治大一统,才能使他们的政治才华和抱负得以施展,唯有帝国政治稳定,才能使他们的仕途通畅。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或载体,人类语言虽数以千计,但世界文字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表音文字体系,另一是表意文字体系。在十几种世界主要文字中,唯有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其他都属于表音文字。所以近百余年来,尤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外学者对汉字多“另眼看待”,而且



多认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或“不科学的”怪异文字,甚至将其和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相提并论。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言论即由此产生,可见对汉字的政治功能,他们缺乏正确的、全面的认知。

汉字作为独一无二的表意文字系统,自从它产生时起便具有两个特点:一、它是语言的简化或缩写符号,所以“文字”(书面语)和“语言”(口头语)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范畴(对表音文字而言,两者是合为一体的,必须“我手写我口”);二、它不受语音(读音)变化的左右,即不随着读音而改变其本义或形体。前者使汉字在同一空间所能容纳和传达的信息量超过任何一种表音文字,这在书写工具与印刷术落后的历史时期尤其重要。后者则使汉字克服了方言问题,即在各地“言异语”(讲不同方言)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了“书同文”。在语音一再变化、方言日渐增多的社会环境里,汉字显得更具弹性与生命力。即使面对外来语的“入侵”,从古代印度的佛教用语到现代西方的科技用语,汉字都能应付自如、采而纳之,并且将它们“中国化”或“汉化”。

自秦始皇规定“书同文”以来的两千余年间,中华帝国就是利用这一独特的文字系统来实现其政治大一统与文化大一统,我们对此怎能熟视无睹?如果中国使用的是表音文字,东汉帝国灭亡三百余年之后,中国是否有可能重归政治大一统?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南北各地区的汉族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必将随着政治四分五裂而逐渐改变其性质与政治地位,即由方言提升为各国的官方语言(即以方言为基础的表音语文),在全中国恢复“书同文”就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可以引用西欧历史作为旁证。在西罗马帝国时代,西欧曾经使用一种共同语文——拉丁文。但随着大帝国的灭亡,封建割据局面的出现,西欧各地区的方言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动力之一。这些方言最终摇身一变取代了拉丁文,晋级为本国的民族语文或官方语文。显赫一时的拉丁文不得不逐渐退出西欧历史舞台,让位给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另一方面,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罗马教廷曾经千方百计试图借助宗教力量将四分五裂的西欧重新整合,置于以日尔曼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的统治之下,即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大一统,但历史证明那只不过是一种梦想。因此,我们相信汉字是大一统理念的产物,而汉字的独特性使其政治功能超越拉丁文或其



他任何一种表音文字。它能够并曾经扮演表音文字所不能扮演的政治角色,对于重建、维系中华帝国的政治大一统功不可没!

注释:

①《孟子·梁惠王上》。

②《商君书·开塞篇》。

③《墨子·尚贤篇》。

④《吕氏春秋·不二篇》。

⑤董仲舒:《对策三》。

⑥《晋书·惠帝纪》。

⑦《南史·宋本纪上一》。

⑧汤恩比、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

⑨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448页。

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页。

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489页。

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5页。